

GUO XUE SI XIANG YU XIAN DAI QI YE GUAN LI

国学思想与现代企业管理

儒家思想与现代企业管理 ◎

墨家思想与现代企业管理 ◎

道家思想与现代企业管理 ◎

法家思想与现代企业管理 ◎

兵家思想与现代企业管理 ◎

邢楠 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学思想与现代企业管理 / 邢楠著.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2.12

ISBN 978-7-206-09345-6

I. ①国…

II. ①邢…

III. ①国学—应用—企业管理—中国

IV. ①F279.2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95288号

国学思想与现代企业管理

著 者:邢楠

责任编辑:张文君

封面设计:孙浩瀚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长春市人民大街7548号 邮政编码:130022)

印 刷:吉林省显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00mm×1000mm 1/16

印 张:11.5

字 数:190千字

标准书号:ISBN 978-7-206-09345-6

版 次:2012年12月第1版 印 次:2012年12月第1次印刷

定 价:32.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绪 论

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在《原始文化》中阐述，文化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讲，是一个复合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人所习得的其他一切能力和习惯。地域文化在不同层面上相互融会、相互结合，一经生成就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并以其特有方式对特定区域的人们在思维方式、行为准则、道德及价值观念等方面产生全面的调节和控制。影响社会集团的每一个成员，使他们遵循着共同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

不同的国家具有不同的文化传统，文化传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进而决定了不同国家的企业面临着不同的管理情景。亚当·斯密（1776）从特定的“经济人”出发，认为任何市场经济只有在共享的道德观即信守契约、履行支付承诺、尊重市场伙伴的基础上才能正常运行。马克斯·韦伯认为，文化对经济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即符合现代精神的文化价值观对现代经济发展起着正面的、积极的促进作用；而与现代社会不符的、传统保守的文化价值观对经济的发展则起着负面的消极的阻碍作用。穆勒（1848）认为，一国人民的信仰和法律对他们的经济状况起很大的作用，劳动力的道德品质对其劳动的效率和价值来说，与智力是同等重要的。他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定位于道德和社会科学的范畴，认为各国的经济情况取决于道德的或心理的，从而依赖于各种制度和社会关系，依赖于人类的本性。马歇尔（1890）认为，文化（包括宗教、道德、观念、理想）因素和经济动机同样决定着人们的行为，他举例说，每个人在经营方面，像在别处一样，他也受到个人情感、责任观念和对高尚理想的崇拜的影响。阿瑟·刘易斯

(1983) 在全面分析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时，将“节约的意愿”和“工作态度”、“冒险精神”等放在了最前面。劳伦斯·哈里森（1985）在他的著作《不发达是一种心态——拉丁美洲事例》里，用大量的案例研究表明，在多数拉美国家，文化成为发展的一大障碍；之后，他又在《泛美梦》一书中列举了进步文化区别停滞文化的十点价值观。迈克尔·波特（1990）的研究表明许多国家都正在努力接受生产率文化，经济文化已不再是一个如何选择的问题，问题在于一国的经济文化何时变化和变得快慢。

从这个角度而言，管理理论可以分为两种基本的类型：一种是只能在某一具体的情境下发挥作用的管理理论，另一种是超越具体情境的普适性管理理论。西方现代管理理论体系一直掌握着世界管理学界的话语权，但其充分发挥作用的前提是存在于西方的文化情境之中。作为根植于中国文化情境的中国企业，需要从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中凝练出适应中国特定文化情境、中国企业管理实践，并与西方现代管理理论相互融合的管理思想。这类传统管理思想不仅可以用于指导中国企业的管理实践，还可以用于指导他国企业的管理实践。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儒家思想与现代企业管理	1
一、儒家思想概述	1
(一) “仁”的内涵	1
(二) “和”的内涵	2
(三) “义”的内涵	3
(四) “信”的内涵	5
二、儒家思想与管理者家庭道德建设	6
(一) 作为家庭伦理分支的流变	7
(二) 管理者家庭道德建设体系的基本内容	10
(三) 结语	12
三、儒家义利观对现代企业管理的启示	13
(一) 儒家义利思想的内涵	13
(二) 现代义利观的内涵	15
(三) 基于儒家“义利”思想构建现代企业义利观	16
附录《论语》	20
第二章 墨家思想与现代企业管理	53
一、墨家思想概述	53
(一) 《墨子》的核心思想	53

(二)《墨子》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	54
(三)《墨子》的军事思想	55
二、基于墨家思想的现代领导者治身管理思想	55
(一)义勇相融的心理素质	55
(二)创新进取的管理素质	57
(三)兼爱互利的价值观	59
三、基于墨家思想的现代管理决策心理思想	62
(一)“助己视听众”的和“以见而知隐”的决策前的信息处理	62
(二)“下情上达”的决策中信息沟通	63
(三)四种决策方法	63
四、基于墨家思想的现代人力资源管理思想	67
(一)重视人才	68
(二)选拔人才	69
(三)使用人才	71
(四)激励人才	73
 第三章 道家思想与现代企业管理	 77
一、道家思想概述	77
(一)崇尚自然的思想	78
(二)睿智的辩证思想	78
(三)朴素的人道主义思想	79
(四)批判的现实主义思想	79
(五)无为主义的思想	80
二、道家天人合一的生态观与作为发展基础的自然资本	80
(一)基于自然资本视角的增长理论回顾	81
(二)“道生万物”对自然资本的再认识	85
(三)“知止不殆”与可持续发展	89
三、道家思想与现代企业文化建设	93
(一)企业文化的内涵	93

(二) 道家思想与企业文化建设的指导原则	95
(三) “朴”思想与吉林省烟草公司延边州公司企业文化建设	96
附录《道德经》	104
 第四章 法家思想与现代企业管理	121
一、法家思想概述	121
(一) 法家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及代表人物	121
(二) 法家思想的主要内容	124
二、法家“术治”思想与现代人力资源管理	130
(一) 禁奸之术	130
(二) 察奸之术	131
(三) 防奸之术	135
(四) 结语	139
 第五章 兵家思想与现代企业管理	141
一、兵家思想概述	141
(一) 作战理论	143
(二) 谋攻理论	144
(三) 形势理论	145
二、兵家思想与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企业跨国并购的机遇、 挑战及对策	147
(一) 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企业跨国并购的机遇	148
(二) 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企业跨国并购面临的挑战	152
(三) 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企业跨国并购的对策建议	154
三、基于孙子兵法视角的企业竞争策略	157
(一) 积聚竞争之“势”	158
(二) 择选竞争时机	160
(三) 运用竞争策略	161
附录《孙子兵法》	166

第一章 儒家思想与现代企业管理

一、儒家思想概述

儒家思想的创始人是孔子，孔子十分推崇尧、舜、禹、汤、文、武时代的道德统治及礼乐文化，他系统地删编整理了《六经》，使其对后世产生“垂世之教”的作用。在此基础上孔子形成了“以仁为本”的世界观和伦理思想。孔子出生在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型的“礼崩乐坏”之时，身处社会的动荡中，他总结了奴隶社会的管理经验，并倾其一生去传播。孟子继承发展了孔子的理论，使儒学成为显学，并游说上层统治者实施推广，使儒家思想逐渐成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及至汉代，董仲舒集儒家思想之大成，以儒家理论为根基，吸收了法家思想“尊君卑臣”和道家思想“天人合一”的理论，形成了一套以儒家思想为中心，适用于社会统治的集神权、君权、父权、夫权于一身的思想体系，由于其适用于社会统治，故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儒学由此成为了官学。北宋时期，以朱熹、二程为代表的程朱理学宣扬宇宙、天理统治人的内心世界“存天理、灭人欲”，由此中国传统的儒学思想从社会主体关系、精神意识等层面上升到了哲学境界。

（一）“仁”的内涵

儒家思想提倡“德治”，其核心理念是“仁”，孔子认为“仁”是社会秩序、道德伦理的最终价值依据和心理本原，在《论语》中，“仁”出现了109次，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仁，亲也。”意味着“仁”实际上是如何对待人、如何处理人与人际关系的道德学说。从字源学上看，“仁”从人从二，指人与人之间相依相偶、独则无偶、偶则无亲。它反映了人自身的觉醒，是由人本身

引申出来的行为原则，它要求人们相亲相爱，具有浓厚的人道精神。“仁”还是“修己安人”、“内圣外王之道”，它要求社会统治者按“仁学”体系进行自我修养，陶冶性情，成为仁德贤明的君主，用“仁”的原则去管理国家、社会、人民。

首先，“仁”是为己与为人的统一，是自爱与爱人的统一。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者！”（《宪问》）由此可见，儒家注重个人修养的目的是为了能治理百姓。孟子亦云：“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

“仁”是儒家尊重人和对生命终极关怀的体现，孔子明确解释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中庸》）仁是人与人之间交往都应具有的道德情感，孟子认为：“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孟子·尽心下》）孟子提倡“兼爱”，“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梁惠王上》）的博爱理想。《乡党》有载：“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孔子的马棚失火，孔子从朝廷回来后，关心的是伤人与否而不问马。这体现了儒家对包括下层平民的“仁”爱之心。

“仁”是调节人际关系的总原则，包括为人之道、待人之道、治人之道。为人之道，是孔子关于人格道德修养和道德完善的思想，是以人自身发展为本，以实现人的最终目标为基本前提的。“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爱人”既包含对人的尊敬、谦恭和亲热之情，也包含推己及人相互理解之意。

（二）“和”的内涵

儒家思想的另一核心概念是“和”，“和”在甲骨文、金文中，字形如成熟的庄稼，说明“和”字起源于“禾”，《说文解字》中认为：和，调也。由此可见，“和”字最初的基本意思就是调适与和谐。“和”是儒家仁爱思想的延伸，孔子说“仁者爱人”，要求人与人之间相互支持、容忍谦让、彼此相爱、无争、无讼。“和”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重要的哲学思想。“和”是儒家为政、为人的基本原则之一，所谓“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论语》中，孔子的弟子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

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在儒家看来，“和”是管理活动的最佳境界，“和”既可用于协调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即治人者与治于人者）的关系，使二者团结，又可协调最高管理者与各级管理人员（即君主与官吏）的关系。在组织内，人们的思维方式与行为习惯都有所差异，如果能做到“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可以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主张天人合一，认为人应顺应自然界的运行规律来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实现人与自然的共生共存，即自然规律、社会规律、自然与人的和谐统一。孟子认为：“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易传·文言传》云：“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荀子也提出“以时禁发”是“王者之法”。

在人与人的关系上，提倡“和而不同”，提倡在坚守个人信念与个性的同时，尊重差异性的存在，倡导求同存异。儒家强调，要实现人与人的和谐，就必须提高每个社会成员的道德修养。《中庸》提倡君子“宽裕温柔，足以有容也；发强刚毅，足以有执也。”要达到“和”，就要求人们“有容”，即容纳不同的意见和接纳他人；“有执”，便是坚持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保持自己的个性和风格。

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提倡“礼之用，和为贵。”这里的“和”是指组织中人际伦理关系的良好状态。孔子在评论子产的政策时说：“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这种“和”的状态就是组织的目标与追求，即所谓“和是礼中所有”，此处“和”是“礼”作为一种制度所具有的结构性的功能。

（三）“义”的内涵

义利关系是中国传统经济伦理观念的核心，“利”在甲骨文中的基本结构是用刀割庄稼，本意是用农具从事农业生产，后被引申为利益、功利，之后逐渐被限定在物质领域。一般认为“利”是物质利益，“义”在广义上是对人们一切社会行为的正当性、合理性的理论概括和抽象，它为规范和评价人们各种社会行为的是非善恶提供了道德的标准。如君臣之义、父子之义、夫妇

之义、朋友之义等。

我国义利观念最早出现于西周春秋时期，“义以生利”，“义，利之本也”，儒家学派继承了这种义利观念，将其发展为重要的经济思想，儒家认为首先应该见利思义。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孔子承认人皆有求利之心，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即认为不能依利行事，对求利活动须以义制约，要“见利思义”，反对违义求利，孟子、荀子也都有关于见利思义的重要论述，孟子言：“尊德乐义，则可以嚣器矣，故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孟子曾说：“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呼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万钟则不辨礼义而受之，万钟于我何加焉？”即使万钟粟米却不分清礼义就接受了，万钟粟米对我有什么好处呢？孔孟特别强调士人君子肩负着协助国君治理国家的重任，是推行儒家仁义主张的重要力量，所以对他们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反复告诫他们绝不可以谋求不义之利。荀子认为义与利均合乎人性，对于合理的利欲应予以满足，对不合理的利欲应以礼义节之，所谓“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见其可欲也，则必前后虑其可恶也者；见其可利也，则必前后虑其可害也者；而兼权之，孰计之，然后定其欲恶取舍，如是则常不失陷矣。凡人之患，偏伤之也。见其可欲也，则不虑其可恶也者；见其可利也，则不顾其可害也者，是以动则必陷，为则必辱，是偏伤之患也。”所谓“前后虑”、“兼权之”、“孰计之”就是告诫人们，当你想求财取利时，要深思熟虑，权衡利弊，看自己所求之利是否符合道义，然后再定取舍。如果不权衡利弊，见利就沾，见财就取，见利忘义，那就难逃动则必陷，为则必辱的境遇。

重利轻义。儒家把义分出轻重层次，凡是关系到维护国家、民族和人民的重大利益，被视为大义。当个人利益和大义发生矛盾冲突时，应当毫不犹豫地牺牲个人利益，“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孟子把

“义”谓为“天爵”、“良贵”，认为“义”远胜于“人爵”（即公卿大夫）和财富的追求：“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认为只有意识到“义”作为人内在需求的独立价值与意义，才能不为苟且之事，不避患难，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荀子说：“义之所在，不倾于权，不顾其利，举国而与之，不为改视，重死持义而不挠，是士人君子之勇也。”即强调社会整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公利高于私利，个人利益必须自觉地服从社会整体利益。

以义制利。荀子强调“以义制利”，他肯定了人好利的本性。“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然而穷年累世而不知不足者，是入之情也。”由于人人都有好利的本性，而且这种好利的欲望是无穷的，但客观上财富是有限的，这就不能不引起对财富的无休止的争夺，结果必然导致天下大乱，因此必须对好利的行为进行限制和约束，不使它侵害他人的利益。荀子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意即人生来就有欲望，如果一味追求而缺乏标准限度，就会发生争夺，产生祸乱，造成穷困。古代的圣王厌恶祸乱，所以制定了礼义来调节人们的欲望，满足人们的要求，使物质和欲望两者在互相制约中增长。荀子认为，礼义本身可以调节社会结构中不同群体的关系，确定度量分界，合理分配物质财富，能够消除和避免纷争，保证社会的稳定。荀子以人性好利为出发点，分析论证了以义制利的内涵和性质。他认为以义制利可以协调人们的利益关系，如果人们对各种利益的取舍都是合乎“义”的，那么好利之欲再多也不会给社会造成危害。

（四）“信”的内涵

《说文解字》将信列入“言”部，说“信，诚也，从人丛言”，即“人言为信”，指人在祭天和祭祖时要言语真实、说话算话。“信”在《论语》中出现了38次。儒家传统思想讲求信，认为信是“人之道”，诚信之德不仅是“立人之本”，而且还是“立政之本”。“人而无信，不可知其可也。”诚信体现在人与人之间的言语和处事行为上，不能言过其实，空洞夸张，

所谓“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巧言令色，鲜矣仁”，“巧言乱德”，“不知言，无以知人也”，“仁者，其言也”。《论语》中记载：“子以四教：文、行、忠、信。”信不仅成为“四教”内容之一，而且与忠一起绾带着文和行，是文和行这两个方面不可或缺的共同精神。孔子将忠和信看作是最主要的道德规范“主忠信”，孟子将信作为“五伦”之一，强调“朋友有信”。至汉代，董仲舒将信列入“三纲五常”之中，日益显示出了“信”在中国传统道德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孔子以信为其“四教”内容之一，要求言而有信，行而有信，故孔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大车无輹，小车无輹，其何以行哉！”儒家认为诚信是社会和谐的重要体现，是一个社会健康的标志。《礼记·礼运》篇中记载：“讲信修睦而固人肌肤之会，筋骸之束也。”意即讲信修睦对社会的作用就如同“肌肤”和“筋骸”对人的作用一样重要。

孔子认为信不但是处世的基本态度，立身处世的基础，更是治国为政的重要条件。子贡问孔子治国之道，孔子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又问，如果要在三者之中去掉一个，首先去掉哪个？子曰：“去兵。”子贡追问，如果要在两者中再去掉一个，应去掉哪个呢？孔子说：“去食。”孔子总结道：“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即治理国家，信为政基，“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信也是中国商品经济的优良传统，是经济活动的基本规范，我国传统商业道德强调商业活动须以诚信为宗旨。《礼记·王制》载：“布帛精粗不中数，幅广狭不中量，不粥于市。”是说如果布帛的升缕度数达不到精布、细布或粗布的要求，宽窄不符合规定，就不能拿到市场上去卖。《孟子·滕文公上》也记载了战国时期一些商人的道德观点：“虽使五尺之童适市，莫之或欺。布帛长短同，则贾相若。麻缕丝絮轻重同，则贾相若；五谷多寡同则贾相若。”就是要求人们在商业活动中做到价格公平合理、童叟无欺。

二、儒家思想与管理者家庭道德建设

2009年，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届中央纪委三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

们党的干部标准是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德”的核心就是党性。”管理者家庭道德作为干部“德”行的重要维度是管理者队伍建设的主要内容。因此,从管理者职业特征出发,结合儒家思想及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经验对管理者的家庭道德进行研究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家庭道德是调整夫妇、父母、子女以及其他家庭成员之间、家庭与社会之间相互关系的行为准则和规范,具有内生性(生成个体道德特质的基于爱情和亲情的内在伦理禀性)、外倾性(向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的扩展)、同一性(理与情、知与行的一致)、对等性(权利与义务、自由与责任、自律与他律的对应)、交融性(历史与现实、个体与整体、特殊性与普遍性的交汇)的特点,一经形成就同民族传统结合在一起,显现出明显的民族继承性。在人类历史上,家庭的血缘关系随社会生产的发展而变化,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儒家思想具有不同的家庭道德规范,因而在考察家庭道德的内涵及外延时,其历史延续性与时代性是重要的考察标准。

(一) 作为家庭伦理分支的流变

1. 周代至春秋——孝德的源起与家庭道德的建构

“经礼三百,曲礼三千”的周礼,以尊尊、亲亲、贤贤、男女有别的四项原则和立子立嫡、同姓不婚、庙祭之制的三种主要制度为核心。孝悌观念至周而大备。周人实行“贵亲而尚齿”政策,将对待老人敬重的依据简化为年龄、血缘两种,这加重了孝悌行为的自然性,为孝悌的推行找到了更多的客观依据,并通过统治者的身体力行,逐渐成为社会共同遵守的道德律条,为后世道德秩序的整饬提供了规范和约束,踏出了家庭道德建设的第一步,周礼“成了中国人进化漫漫长夜中出现的第一道明亮的精神曙光,是古代中国社会向文明道路迈进的一个重要标志。”^①

及至春秋时代,以周礼为核心的家庭伦理道德面临重构的困境,嫡长子继承制成为了矛盾的焦点,行“六逆”(贱妨贵,少陵长,远间亲,新闻旧,小加大,淫破义),犯“六顺”(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悌),当

^① Chen Youfang. Chinese marriage custom and social ethics [M]. SiChuan: Bashu Publishing House, 2000.

此时，孔子对周礼择善从之，在“仁者爱人”的理念框架下将“亲亲，尊尊”的伦理规范和下层民众家庭的古朴情感相结合，因革损益建构出一套由“宗法”转向人伦的新的家庭伦理道德。孔子强调“孝”不仅是物质上的供养，更重要的是感情上的爱护和尊敬。《论语·为政》载：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①“仁”的理念也体现在夫妻的伦理规制中，儒家把夫妇之伦视为“五伦”之首，将男女的结合、婚姻的缔结、夫妇的形成作为一切社会伦理的肇始，在认可维护男尊女卑的传统上有所突破，比如针对男子有单方面的“七出”离婚特权，先秦儒家提出了“三不去”原则，即：“有所取，无所归，不去；与更三年丧，不去；前贫贱，后富贵，不去。”这也是后代“不以富贵易其妻”思想的源头。

2. 明清早期——带有启蒙色彩的家庭道德

从明嘉靖初至清道光中，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关系发轫于中国社会，从儒家文化中氤氲而化的明清早期启蒙文化，孕育了中国式新家庭道德的历史根芽，成为传统家庭道德向近代转型的历史结点。对女性的尊重，对男女平等的热烈颂扬，以及对传统贞节观的批判，使明清时代的家庭伦理灼灼闪耀着近代人文主义的光辉。明清时代的启蒙者突破了儒家封建伦理纲常的桎梏，对封建“孝”道的绝对合理性进行辩驳，他们认为，传统家庭伦理的孝道，以善事父母为特征，体现着人类天伦之爱的至情至性。然而随着孔子后学尤其是两汉儒学和宋明理学对孝的政治化、宗法化，孝的社会功能和文化意义异化为封建宗法专制的工具，因此应该使“孝”回归到健康的家庭道德模式中即“父慈子孝”，这种带有启蒙色彩的伦理思想成为了中国传统家庭伦理向近代嬗变的先声。

3. 晚清——传统家庭道德的背离与回归

1840年的鸦片战争逼迫着古老的中国在坚船利炮的淫威下踏入近代，“欧风美雨”夹杂着异域的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急速地渗入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加速了中国传统家庭伦理的解体。一群来自广西大山的革命者，首先对传统的家庭伦理摆出鲜明的拒绝姿态，以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天国的将

^① Kong Zi,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M].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6, 16.

士们，挟千里席卷之势涌入金陵，在建立同清朝对峙达十余年之久的政权的同时，亦经历了对传统家庭伦理的背离——回归之路。

平等——太平天国将士们从西方基督教中寻找到的有力武器，在它的旗帜下，太平天国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冲破了纲常伦理之维，跨越种族、性别、家庭的种种界限，摒弃传统社会的尊卑等级观念，建立了一个“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乌托邦。虽然后来太平天国的领导者由于缺乏基于新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经济基础所产生的民主主义思想，回归到了封建家庭伦理道德的框架中，但这场变革如长戟刺穿了中国历经千年形成的坚固桎梏，为“五四”时期波澜壮阔的彻底颠覆带来清透的曙光。

4. “五四”——颠覆与重构的家庭道德

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因袭而成的旧文化进行了旗帜鲜明的扬弃与超越，在它的冲击下，封建纲常礼教逐步解体，新的伦理道德规范渐次建立，“五四”成为了中国传统家庭伦理向近代转型的重要界标。

中国传统社会是反对自由恋爱和婚姻的，正如焦国成在《中国伦理学通论》中论述的“以个体的利益服从于家庭和家族的利益，就是宗法登记制下婚姻的伦理实质”。新文化运动不但提倡自由恋爱和自主婚姻，还主张“离婚自由”，认为自由结婚的根本观念是要夫妇相敬相爱，夫妇之间没有爱情，不能互敬互爱是可以离婚的。经过对封建男女关系、婚恋关系的批判，社交公开和婚恋自由开始成为人们的共识。婚姻以爱情为基础得到了相当一部分人，尤其是知识青年的普遍认同，这构成了近代婚姻家庭伦理观念的重要内容。

反对封建“节烈观”，提倡男女平等，攻讦封建“孝道”也是新文化运动的批判焦点，鲁迅的檄文《我之节烈观》强音响彻的鼓舞女子具有自立的精神，提出“要除去于人生毫无意义的苦痛。要除去制造并赏玩别人苦痛的昏迷和强暴。我们还要发愿：要人类都受正当的幸福”。1919年，已经背负了“非礼非法”“忤逆”罪名的吴虞，在检讨了中国家族制度的弊端后，写下了猛烈攻讦封建“孝道”的《说孝》。同样在1919年，“动辄便把中国日益深化

之危机的全部责任都归之于孝道”^①的胡适，发表了她的白话诗《我的儿子》及相关的通信。这些作品典型地反映出个体在面对稳定的传统道德秩序时的激烈态度与反抗姿态。“五四”的“非孝”意识旨在反对并破坏“非人”的传统伦理道德秩序，这种以否定为指向的道德观念，是作为新的道德目标的前提而存在的，所以“五四”“非孝”所“非”的不仅是一个伦理核心，包括“非孝”的倡言者曾经恪守的旧的行为准则。

冯友兰先生曾提出“家族制度在过去就是中国的社会制度”。^②通过上述梳理，我们可以看出，儒家的社会伦理与家庭伦理在历史变迁中高度密合成为一个内容充实而又丰富的伦理实体，其中的父子、夫妻、兄弟、男女地位等关系是儒家家庭伦理的核心内容。

（二）管理者家庭道德建设体系的基本内容

儒家传统社会伦理与家庭伦理的同构性，源于宗法社会结构的单一同质特性。这种由宗法血缘关系推演、由亲情扩展而成的农业社会的伦理，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必然需要重新整合。现代家庭道德既注重汲取儒家传统家庭道德的合理成分，又注重个体社会化的独立人格和使个体具有高成就动机的价值标准，现将管理者家庭道德体系分列为三个指标，即婚姻道德、孝德和亲子道德。这些指标的提炼依据主要在两个方面：（1）文献中选取。（2）现行法律依据。2001年，中共中央在《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中提出：“要大力倡导以‘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夫妻和睦、勤俭持家、邻里团结’为主要内容的家庭美德，鼓励人们在家庭里做一个好成员。”这是对家庭美德在原有历史内涵上的新时期阐释。

1. 婚姻道德

婚姻道德是调节夫妻之间关系的行为准则，是家庭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分析表明，管理者生活作风问题，已经成为诱发严重腐败的普遍原因。全国人大《婚姻法》起草专家小组负责人巫昌祯教授的一个调查显示，在

^① Hu Shi and chinese renainssance [M]. zhejiang: Jiang Su People' s Publishing House, 1989, 174.

^② Feng YouLan, A Shot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M]. Bei 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1995, 24.